

198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缘起

樊 超

内容提要 “一条线”战略的缺陷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此战略的实施揭示出苏联的战略困境,增强了中国应对苏联战略压力的信心,使中国具备了战略调整的前提。“联美反苏”的构想给美国造成了中国有求于人的印象,导致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为打破“一条线”战略束缚对美政策的局面,中国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从而牵动了外交战略的调整。这次调整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国对美、对苏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地位相对降低,开启了中苏关系缓和的进程,重新重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外交战略 邓小平 “一条线”战略

1980 年代,中国放弃了“一条线”战略即联合美国、日本、欧洲等同一纬度上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中国的外交战略经历重大调整,内容主要包括对苏美和第三世界的政策调整:(1)在对苏政策上,中国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利用中美苏三角关系松动了对苏政策,在有限的接触中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2)在对美政策上,通过“八一七公报”重新稳定了中美关系;从公报谈判时开始,疏远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专心推动经贸文化关系的发展。(3)重新重视和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三个方面的调整改变了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

关于外交战略的转变原因,目前的研究有四种解释。第一类解释认为,对时代

* 樊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感谢牛军教授、张清敏教授和《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疏漏与谬误由笔者负责。

主题判断的变化,或者是反思对苏联威胁的判断导致了外交战略的变化。^①但是,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变化最早只能追溯到1984年下半年,以此解释1982年的外交战略转变,显然不合逻辑。同时,安全议题是中国对苏政策的核心关切,如果没有关键的刺激因素,即便纠正了对苏联威胁判断的偏差,也很难改变中国依托“一条线”战略解决苏联战略压力的思路,所以,反思苏联威胁只是战略调整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第二类解释认为,在美苏僵持的情况下,中国为保持国际战略的平衡而调整外交战略。^②这种抽象的观点脱离了具体的决策过程和作用机制,等于失去解释作用。第三类解释认为,“一条线”战略损害了中国的和平形象,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因而有必要进行调整。^③“一条线”战略确实会在政策层面带来这样的消极作用,但尚不足以撼动中国的安全战略构想:其一,决策层是否察觉并在意这种消极作用,尚无法证明,单纯依靠理性决策的逻辑进行反推,显然是不可靠的;其二,真正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因而只有中美和中苏关系才会导致“一条线”战略的调整。第四类解释则认为,战略调整是以上诸因素综合的结果,^④只有少数研究提到美国对台军售的直接作用。^⑤但是这类解释是各种原因的简单堆砌,缺乏时间上的立体感,无法说明战略调整的内在逻辑,也不具备解释力。

为什么中国外交战略会发生调整呢?本文认为,“一条线”战略给美国造成了中国有求于人的印象,导致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为打破“一条线”战略束缚对美政策的局面,中国疏远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从而牵动了整个外交战略的调整。1980年代外交战略的调整塑造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和基本面貌,澄清其转变原因,有利于厘清中国安全战略的演变过程,也利于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推进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所在。本文尝试在辨析档案、回忆录和报纸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一条线”战略的缺陷,从决策的视角澄清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原因和内容。

① 宫力《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与中美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6期,第15页;宫力《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考与历史经验》,《第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2005年,第572页;耿庆彪《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宁夏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第34页。

② 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页;田增圃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宫力《时代主题与中国国际战略的转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34页;周丽娟《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从结盟到不结盟》,《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59页。

③ 曲星《中国外交50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0—451页。

④ 张清敏《对外关系读本》,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285页;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62页;颜秉征《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回顾》,《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1期,第87—88页;胡联合《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66页。

⑤ 张清敏《对外关系读本》,第284页;颜秉征《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回顾》,第88页。

一、“一条线”战略的缺陷

从根源上讲,“一条线”战略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对安全威胁的高估及由此产生的对安全的极度关切,导致这一战略在构想之初就有内在缺陷。本文主要从影响中美、中苏关系及国家安全的视角,探讨“一条线”战略的缺陷。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外交战略的对抗性。“一条线”战略建立在高估苏联威胁的基础上,加上中苏在1970年代末恶性的战略互动,使得“一条线”战略极具进攻性。但与苏联的对抗并未招致对方的激烈报复,它实际上让中国摸清了苏联对华战略施压的底线,认识到苏联威胁的有限性。

对苏联威胁的高估,比较系统地体现在“三个世界”理论当中。尽管中国领导人或外交部门从未给过严格的概念界定,但从比较权威和详细表述来看,它实际上是中国在“一条线”战略下划定敌、我、友的方法。在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美苏被视作“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将苏联威胁与世界大战的危险联系起来,显然是为了突出超级大国,尤其是苏联与其他国家的矛盾,以便号召、组织针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①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台一般都伴随着理论论证的过程,对苏联的定性则与“帝国主义战争论”结合起来。理论抽象的结果就是给苏联贴上了“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标签,苏联对中国施加的战略压力就成为这些标签的证据。尽管“文革”结束后,许多领域都消除了“左”的思想,但在外交上,只要苏联没有消除对中国的战略和安全压力,这一标签就难以找到取消的理由。这样,苏联威胁不仅成为军事安全问题,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理论问题。“帝国主义战争论是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的理论信仰,要打破以此为基础的思维习惯殊为不易。

在珍宝岛冲突之后,中苏间的恶性互动便日益升级,使毛泽东十分警惕苏联的动向。1969年3月15日,在听取珍宝岛战斗的汇报时,毛泽东就规划过诱敌深入等战略战术问题。^②4月底,毛泽东提出“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提出诱敌深入与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第1版;人民日报编辑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第1版。

^② 毛泽东《在听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6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55—356页。

人民战争的原则。^①出于对苏联的深刻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提出了“越讲缓和越备战”的逻辑。^②从此,中国在军事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针对苏联部署国土防御。1972年总参专门派出调查组,检查落实“三北”地区的战备情况。9月,叶剑英在视察七机部时提出,要加快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以增强国防预警能力。1973年,解放军普遍开展反集群坦克作战的训练和演习。^③1975年初,邓小平在听取总参汇报时再次强调诱敌深入和歼灭战的原则。^④在2月份的会议上则强调加强“北面”的工事,“不让敌人长驱直入”。^⑤但是,面对苏联先发制人的军事哲学和压倒性的战略优势,这些军事准备都显得不足以保证国家安全,“一条线”战略的诞生实际上就是为了弥补中国在对苏战略上的弱势处境。

第二,“一条线”战略塑造的“联美反苏”的格局限制了中美政策的灵活性。中美缓和之后,中美关系受三方面影响:一是中美间的遗留问题,这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二是中美间的战略关系,这既是两国关系的主要动力,又受两国对苏政策差异的限制;三是中美间的经贸文化关系,这一关系到1980年代中后期成为两国关系的凝聚力。三个方面决定了中美关系既斗争又合作的特点。但在建交初期,“联美反苏”是中国对美政策中最迫切的需求,它限制着中国处理双边矛盾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中国的对美政策。

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一条线”战略促进了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这也是它可以延续到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则是积极倡导这一战略的代表人物。作为曾主管外事的副总理,^⑥邓小平参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想与实施。“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⑦再次复出之后,邓小平仍坚持苏联威胁的判断和“一条线”战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制定的。这个思想指导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对外政策”。^⑧

① 毛泽东《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准备打仗》(1969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59页。

② 毛泽东《越讲缓和越备战》(1974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96页。

③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613页。

④ 邓小平《当前军事工作的几个问题》(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⑤ 邓小平《压缩军队定额,抓好装备质量》(1975年2月8日),同上书,第9、11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076—1077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317页。

邓小平复出后极为关注安全问题,并且强化了“一条线”战略。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会见河野洋平时说“打世界大战只有两家有资格,即苏联和美国。苏联更具冒险性。”^①9月25日,在会见联邦德国客人时,他提出“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我们不相信有持久和平,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美国单靠自己对付不了苏联,要同欧洲联合起来。”^②28日,邓小平在会见菲律宾军事代表团团长时谈到“我们不仅要发展海军,还要发展空军、陆军,但都是着眼于防御,做好反侵略准备。”^③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重心,但面对如此迫近的威胁,现代化建设也只能依靠延缓战争来实现。“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样就可以延缓战争。”^④1977年10月7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邓小平说“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早打不怕,大打也不怕,就是使用现有的装备打也不怕。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装备更好些,那就更不怕了。最重要的是使人民都知道,要加强战备,……就有可能延缓战争。”^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对威胁的判断更加严峻,对抗态度也更加坚决,更具进取性。10月26日,邓小平接见法国客人的时候谈到,“中国政府反对霸权主义,有三个办法:第一,有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第二,破坏它的全球战略布局,打乱它的战争时间表。第三,不搞绥靖主义。”^⑥1977年底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强调延缓战争、抢时间的同时,也指出“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仍要备战,因为“霸权主义的疯狂性”制造的小事,仍然可能挑起战争。^⑦无论这种判断是否与事实完全相符,它已经构成了中国安全战略的基本前提。

二、“一条线”战略的强化

对苏联威胁的判断之所以变得更加严重和紧迫,关键是因为在1970年代末,苏联的全球战略开始围绕中国的周边展开,导致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评估不断升级。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200—201页。《日〈每日新闻〉刊载河野洋平的文章〈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深切感到新的力量〉》,《参考消息》1977年9月21日,第6842期第4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205页。

③ 同上书,第208页。

④ 同上书,第205页。

⑤ 同上书,第217页。

⑥ 同上书,第229页。

⑦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第80页。

作条约》。^① 11月底,与中国日益交恶的越南大规模入侵柬埔寨。立刻引起了中国的警惕和防范,认为苏联同越南结盟,是其全球战略向印度支那半岛延伸,越南入侵柬埔寨,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图。^②

1979年1月6日,邓小平会见欧洲议会议长时说“看来国际局势没有什么缓和,应该说,战争的因素至少不是减少了。现在我们需要一切愿意保持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力量联合起来,不能无所作为。……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争取比较长的和平环境。”^③借重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力量,成为应对苏联的重要方法,而超级大国美国,显然是重中之重。用邓小平的话讲“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④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更侧重从战略角度理解中美关系,也希望美国向自己靠拢,从战略上稳定中美关系,而不仅仅是在需要对抗苏联的时候才加以利用:“美国单靠自己对付不了苏联,……不要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使用”。^⑤早在1977年9月,邓小平与布什谈到“战争总要来的,没有什么持久和平,但战争可以延缓。延缓战争的办法就是不要放松警惕,不要搞绥靖主义,……很遗憾的是中美关系也没有什么变化。……中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从长远观点、从政治角度、战略角度看问题就容易下决心。”^⑥1978年1月4日,在与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提到“我们希望两国正常化的进程越快越好,……归根到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来解决。”^⑦显然,中国对中美建交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安全考虑。

中美建交及邓小平访美,使得中国在对苏、对越政策上获得了主动。在规定两国关系框架和基础的建交公报中,中方争取写上的反霸条款“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⑧邓小平访美期间,不但公开谴责“苏联全力支

① 《塔斯社播发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参考资料》1978年11月5日,第7252期。

② 《苏越条约是向东南亚扩张阴谋的产物》,《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3日第5版;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p. 409.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467页。

④ 同上书,第287页。

⑤ 同上书,第205页。

⑥ 同上书,第207—208页。同样的论断参见1980年8月28日、9月9日,李先念分别同意大利客人、美国防副部长的谈话,《李先念传》编写组、湖北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1909—1992)》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24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254页。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第1版。

持下的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狂妄地进行着大规模的军事侵略”还表示为了维护国际和平，“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①在与卡特的会谈中，邓小平将越南的行动与苏联的战略布局联系在一起，提出将对越南采取有限的惩罚。^②邓小平访美后不久，1979年2月17日，中国发起对越作战，并向柬埔寨提供军事物资援助，^③从此开始了与越南长达十年的边界对峙。中国既然已经确认了越南是在苏联的支持下进行的反华挑衅，^④那么对越南的军事行动，以及将军事行动与越南停止对柬埔寨的侵略联系起来，其更深层的意义就是打击苏联在中国南部侧翼的战略部署。

同时，苏联针锋相对的在中苏边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与越南遥相策应的意图十分明显。中国毫不示弱地在对面布置了优势兵力。^⑤但是，苏联却没有采取更激烈的措施。对越作战发起之后，美国致函苏联，敦促其不要采取恶化形势的步骤，并暗示苏联若不保持克制，美国将会采取相应步骤。在收到勃列日涅夫的强硬回复之后，卡特仍然不为所动。^⑥从一连串反应来看，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显然给苏联造成了一种印象：中美之间在对抗苏联及其盟友的问题上有着高度的战略协作，苏联怀疑和忌惮美国所发挥的作用，是其反应有所克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场斗争在战略上的效果是鼓舞性的。它起码让中国领导人相信，“一条线”战略可以保证国家安全，使形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⑦此后，中国在对苏政策中表现得更趋自信和强硬。4月3日，中国决定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⑧在7月18日的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邓小平提出“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要采取‘一条线’思想……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⑨9月18日，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邓小平谈到，中苏间的障碍不仅仅

① 《在华盛顿由六个美国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上，邓小平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第1版。

②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Toronto;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3, pp. 208-209.

③ 《越南当局的霸权主义逻辑》，《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第1版。

④ 《苏越条约是向东南亚扩张阴谋的产物》，《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3日第5版；《陈楚代表在安理会讨论东南亚局势时发言，揭露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北欺中国西侵柬埔寨，要求立即制止越南侵柬和对中国的武装挑衅》，《人民日报》1979年2月26日第5版。

⑤ 《美报专稿〈有消息说在苏中边界一带举行演习〉》，《参考消息》1979年3月19日，第7386期第2版；孙艳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邓小平对苏外交决策》，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国际冷战史研究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⑥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pp. 412-413.

⑦ 邓小平《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198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77页。

⑧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举行全体会决定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人民日报》1979年4月4日第1版。

⑨ 何方《漫长的过程 沉重的代价：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十讲（之二）》，《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0期，第130页。

是边界问题,还有“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中苏双方都不在对方的邻国建立军事基地。苏联应该放弃支持扩张和霸权主义”。^①

但此后,苏联的对外战略继续刺激中国的决策中枢。1979年岁末,苏联入侵中国西部邻国阿富汗,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反苏态度。1980年1月6日,在欢迎穆巴拉克的致辞中,邓小平谴责这是苏联谋求世界霸权的重要步骤,“中国政府 and 人民将同阿富汗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挫败苏联的侵略和扩张而斗争”。^②1月20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指出,“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苏第二轮谈判在当前不适宜举行”。^③由此中断了自1979年10月开始的中苏改善国家关系的谈判,中苏边界谈判也随之中止。^④3月10日,李先念会见美国客人时说,“解决阿富汗问题首先是苏联无条件地从阿富汗撤军”。^⑤7月,他又谈到:战争不可避免,“有些人不给我们和平,因此,我们不赞成退却、让步和绥靖主义的思想”。^⑥可以说,苏联入侵阿富汗使中苏间在战略上的互动持续恶化,中国表现出少有的强烈回应,但也切断了与苏联的互动渠道,丧失了在大三角关系中的回旋余地。

由于这种刺激,早在1979年4、5月间就确立的深化中美战略关系的共识,很快得到了落实。1980年1月5日,美国防部长布朗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苏联的侵略扩张问题。^⑦1月24日,美国防部宣布向中国出售非杀伤性军事装备。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耿飚访问华盛顿时,布朗宣布向中国出售与军事相关的装备和技术。^⑧美国对华军事出口政策开始放宽。3月17—19日,中国副外长章文晋赴美进行工作访问,同美国政府高官就“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越南入侵柬埔寨所造成的局势”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讨。^⑨更为直接的是,从阿富汗战争一开始,中美就直接介入了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支援,在情报、武器、后勤、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556—557页。

② 《邓副总理在欢迎穆巴拉克副总统的宴会上强烈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霸权主义行径 要求苏当局立即撤出一切武装部队》,《人民日报》1980年1月7日第1版。

③ 《苏入侵阿富汗威胁中国安全 中苏谈判当前不宜举行》,《人民日报》1980年1月21日第1版。

④ 周晓沛《中苏边界谈判》,《传承》2010年第31期,第21页。

⑤ 《李先念传》编写组、湖北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1909—1992)》第六卷,第108页。

⑥ 同上书,第120、126页。

⑦ 《布朗部长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 美中双方会谈坦率和富有成果 两国共同战略目标领域越来越多》,《人民日报》1980年1月10日第4版。

⑧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Chronology, 1978-1989*, New York: Foreign affairs, 1990, p. 83.

⑨ 《章文晋副外长在北京进行工作访问 同万斯等会谈 受到蒙代尔副总统接见》,《人民日报》1980年3月21日第6版。

略协作等问题上开始了合作。^① 苏联的动向促使中美的军事和战略合作得到丰富和深化,开始向具体的技术层面发展。

中美战略合作的提升显然是令中国满意的,中国也在积极反苏的过程中察觉到苏联的战略困境。从1980年9月开始,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境地和在战略上的困境就已经显露了出来。^② 这一情况显然被决策层捕捉到了,继而对战争威胁的评估趋向缓和。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总参的会议上指出,“延缓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甚至比五年多一点时间还有可能。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争取更多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③ 10天后,这种态度更加明确“我在一九七五年说过,五年打不起来。五年过去了,没有打。现在看,再有五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还是建立在过去那种估计的基础上。备战经费,可以挪出一部分来搞经济建设。”^④ 1981年1月,他在会见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时谈到“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不要过分严重估计形势,不要造成人为的紧张,天天生活在恐惧状态中不行。”^⑤ 3月3日,他与总参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到“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强调战争马上打起来,……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即便大战马上打起来……又有什么可怕的!”^⑥ 一旦明确了建设优先于战备,说明战争的威胁已经不足以干扰国家的建设。

“一条线”战略的强化揭示了苏联威胁的有限性,增强了中国应对威胁的信心,它起码让决策层对中国的战略地位有了积极认识。从大三角关系来看,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下降了,但是这只能作为战略调整的前提。因为消除苏联威胁是整个1980年代中国对苏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核心,若中美关系沿着既定状况发展,很难想象中国会仅仅因为战略地位的略微改善,就放弃“一条线”战略这个对苏施压的杠杆。此外,“一条线”战略与当时中国整体的对美政策是并行不悖、具有促进作用的。在改革开放的方略下,中国急需美国在现代化建设上的支持,所以在对美政策上受到的限制是来自多方面的。从对《与台湾关系法》的反应来看,中国一定程度上允许这种政策受限的局面存在。所以,仅仅“一条线”战略自身缺陷的暴

① S. Mahmud Ali, *US-China Cold War Collaboration, 1971-1989*,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75-177.

② 《希报文章〈阿富汗,波兰:苏联的“越南”〉》,《参考消息》1980年9月27日第7942期第4版《西方观察家说:苏联在阿富汗困难重重无法脱身》,《参考消息》1980年12月24日第8029期第1版《哈希文章〈1980年对莫斯科来说是倒霉的一年〉》,《参考消息》1980年12月29日第8034期第1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④ 同上书,第173—174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708页。

⑥ 邓小平《大仗几年打不起来,不要造成人为的紧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86页。

露,还不足以导致整体战略的变化。而对台军售问题让对美政策受限的局面恶化到中方无法容忍的地步,才将中美关系的调整推上议程。

三、中美关系的调整与战略转变

中国一直寻求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但出于安全和发展需要而在对美政策上受到束缚,限制了对美施压的主动权。建交谈判时,中方调整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在美国没有承诺停止对台军售的情况下,决定先建交,保留继续与美国讨论对台军售的权利。^①于是,对台军售就成为中美关系中不受协议约束的难题。就在对越作战正酣的时候,《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就显露出中国在对美政策上受到的束缚。当时中国的反应是相当克制的,只是在外交渠道和首脑外交的场合表示了反对。^②中国官方媒体当时并未对此表示公开谴责,以《人民日报》为例,直到1980年8月28日因里根竞选团队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才首次提及《与台湾关系法》。^③这与当时“联美反苏”的态势是分不开的。里根政府上台后坚持升级对台军售,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要突破中美关系既定框架的意图。中美关系基础被动摇,显然超出了中方容忍的底线,促使决策层决心打破对美政策受限制的局面。于是中国在1981年与美国就对台军售问题展开了谈判。

这次谈判引发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在对美、对苏和对第三世界政策上都产生了影响。谈判产生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根据外交部美大司的外交官回忆,决策层在1981年1月11日确定了对美外交斗争的决策,决定对美采取强硬态度。在大三角关系的逻辑下,这必然牵动对苏联威胁的判断及对苏政策。对此,邓小平认为“如果中美关系倒退,苏联也只能凶到那么个程度嘛!”美苏僵持的态势使邓小平相信,应该抓住美国的困难,在对美交涉中使用边缘政策。^④1982年3月4日,在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李先念也指出,“如果双方谈判不成,准备两国关系回到一九七八年以前,甚至一九七二年前的水平”。^⑤

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这两次会议的完整记录和对美斗争的方案设计,但从中国对美决策的惯例来看,中方应该是针对目标实现的程度,设计了多套方案。其中

① 钱江《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②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507—508页。

③ 本报评论员《里根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哪里》,《人民日报》1980年8月28日第1版。

④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134、144页;彭迪《美苏在全球的战略态势》,《参考消息》1982年1月11日,第8407期第1版。

⑤ 《李先念传》编写组、湖北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1909—1992)》第六卷,第163页。

最为严重的设想就是动用边缘政策，“经过曲折之后保持原来的中美关系”。^① 这起码说明两点：（1）苏联的战略困境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依赖程度，中国对美政策所受的限制已经大大下降；（2）谈判中使用边缘政策并不改变中国对美政策的大方向和总体目标。要保持中美关系的发展，边缘政策的破坏作用必定是受控制的。

里根尚未就任时，邓小平就注意到美国政界存在着中国有求于美国的观点。^②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史蒂文斯参议员和陈香梅时，专门驳斥了这一观点，提醒美国不要因为中国的“穷和弱”就忽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价值；中国的生存能力很强，即使不求人，自己也能活下去。“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③ 且不论里根政府对台军售政策的真正原因，起码在邓小平看来，正是因为存在这种观点，才让里根政府敢于坚持强硬的态度。中国随后对美政策的调整必然涉及双方最热络的安全合作。因此，中国在谈判过程中拒绝了与美国的战略磋商和军事合作动议，降低了战略合作的调门，甚至开始谴责美国的对外政策。尽管某些战略合作得到保留，但中国已经表现出结束“一条线”战略的姿态。

中国与美国就美对台军售谈判的第二个影响是：中美关系的龃龉迫使中国在第三世界扩展外交回旋余地。在邓小平看来，第三世界深受超级大国的剥削和威胁，最有可能坚决地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最能胜任反霸力量的角色。^④ 1981年2月25日，正是里根上任不久，李先念就在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和一大依托，……穷朋友可靠。”^⑤ 此后，中国领导人在会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时几乎都要提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⑥ 1982年之后，邓小平在外交场合不断提倡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强调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⑦ 美国的对台政策使邓小平觉得“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看不起我们，想欺侮我们，因此我们十分重视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⑧ 1982年1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

① 王立《波澜起伏：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134页。

② 《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4日第1版。

③ 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页。

④ 《邓小平会见塔勒希时说 第三世界是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主力》，《人民日报》1982年8月20日第1版。

⑤ 《李先念传》编写组、湖北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1909—1992）》第六卷，第135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716、725、748页。

⑦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文集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⑧ 同上书。

说“我们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是需要战斗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是不希望我们取得发展的。”^①4月底,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明确了第三世界的政策“最近我们不断讲加强第三世界的联合和相互支持、相互援助。我们的对外政策也由原来的两句变成了三句,即加强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②尽管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可能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但从当时的背景和领导人谈话的针对性来看,中国领导人是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其国际战略价值:与第三世界的合作利于增强其独立性,可以打乱超级大国战略布局,削弱超级大国任意摆布侵害弱小国家的能力。

第三个影响则是中国对苏政策的调整。此前中国一直避免在受苏联威胁的状况下谈判,但中国战略地位的相对改善,增加了对苏要价的资本,中苏谈判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在中美苏战略三角的逻辑下,适当的松动对苏政策,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对美国要价的资本。

所以,当苏联表达出接触意向的时候,中国的态度也积极起来。1982年2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暗示,苏联愿意密切与中国的关系。^③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时谈到中苏关系,除了指责中国的对苏政策,也释放出与以往不同的、和缓的信号:(1) 绕开意识形态争执,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2) “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3) 建议恢复两国边界谈判;(4) “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④在中美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苏联抛出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态度,并建议恢复两国间的谈判,显然极具针对性,意图借中美摩擦的机会改善自身战略地位。尽管一句“不带任何先决条件”表明苏联并未改变以往的立场,与中国要求首先消除安全威胁的立场依然无法调和,但中方还是十分重视这一机会。根据钱其琛的回忆,就在24日当天或者25日,邓小平打电话给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⑤建议表态的形式既可以回应攻击,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3月26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声明“我们注意到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

① 《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说 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是需要战斗的》,《人民日报》1982年1月2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819页。

③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Chronology, 1978-1989*, p. 146.

④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1982年3月24日),《参考消息》1982年3月27日,第8481期第1版。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806页;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苏联的实际行动。”^①3月30日,苏联的《真理报》报道,莫斯科对中国的反应感到满意。^②

从中方的反应时间和表态来看,这次回应很可能是一次谨慎的试探。在中美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这种反应可能含有向美国施压的策略性考虑,也不排除重建大三角关系平衡的总体考虑。中苏在相互试探中的积极态度,推动了中国决策层松动中苏关系。7月中旬,中美谈判取得进展,中美关系得以稳定的前景已经明了。7、8月间,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条件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③经过中苏的交涉,中苏副外长级谈判于10月份在北京开始,开启了正常化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松动对苏关系的前提只关注安全议题,不再纠缠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有紧密联系的,它将中苏的意识形态矛盾和安全矛盾剥离开来,简化了中苏矛盾的复杂程度,减轻了中苏关系的负担。1977年8月3日,为论证“一条线”战略及苏联的威胁,邓小平曾让胡乔木牵头撰写关于三个世界的文章,于是便有了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外交领域“左”的思想仍未得到改变。尤其是对越作战之后,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为继续在理论上反修的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于1979年成立,研究苏联是怎样变修的,想写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之类的书。但研究小组认为,以前指责苏联变修的那些理由大多站不住;而改革开放所要进行的探索,在某些方面会更甚于苏联,因而一直难以完成研究的初衷,情况最后由宦乡上报给胡乔木。^⑤从结果看,此次研究更多的是起到了理论反思的作用。1980年初,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组织撰写和上报了六篇关于国际形势的内部《讨论稿》,认为“三个世界”理论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不宜再提。尽管当时没有被决策层接受,但从后来战略调整的结果来看,基本是与这些观点相契合的。^⑥可以说,改革开放形成的思想解放与争鸣氛围触动了对外交政策的讨论,为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准备,从理论上推

① 《就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人民日报》1982年3月27日第1版。

② 《苏报报道:我对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反应》,《参考消息》1982年4月1日,第8486期第1版;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835页;钱其琛《外交十记》,第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170页;文章内容参见前引文《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⑤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

⑥ 何方《漫长的过程 沉重的代价: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十讲(之二)》,第131页。

翻中苏关系中意识形态争论的基础,有利于促进决策层在外交上更加关注现实利益问题,利于“为现代化建设塑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外交上的优先议题。

中苏关系的松动,让处于隔绝的中苏关系又建立起互动的机制,使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又重新获得了回旋的余地。此后,中国十分小心地控制着中苏关系缓和的进度。一方面,这可以利用中美关系对苏联施压,因为从消除三大障碍前提设定来看,安全议题仍是中国对苏政策的核心关切。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中苏的接近对中美谈判产生干扰,有助于打消美国的战略疑虑,防止边缘政策失控。所以,在中美谈判期间,邓小平曾指示,“先同美国达成协议,再调整对苏关系,对中国更为有利”。^①可以说,中国此时的对苏政策包含了多重目标,既要拓展对美政策的回旋余地和筹码,又要使中苏关系的进展符合中国的安全需要。这样,中国在对美和对苏关系上的此消彼长终结了“一条线”战略。

“一条线”战略的缺陷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根源,对美政策的调整是战略调整的起点。“一条线”战略缺陷的暴露,首先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依赖。随着对美政策受束缚的局面日益恶化,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促使中国结束了“一条线”战略。围绕中美关系的调整,中国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重新重视第三世界,这既改变了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也有助于中国外交摆脱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为冷战后时代的中国外交铺垫了基础。其作用超出了安全战略的范畴,具有全局性和历史性的意义。

^①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150页。

When China's developing country status was steadfast, China and the Group of 77 shared common values and interests and therefore coul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effectively. However, after China's developing country status becomes an open question,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and the G77 to cooperate—common interests—have been gradually weakened, even leading to the end of the cooperation. In this sense, 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a's power status has also become the critical junct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G77 cooperation framework.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was such a turning point not only for China's power status, but also for China-G77 cooperation, which turned from close to loose. Although the cooperation has not dissipated completely, it will face more challenges ahead and will unlikely rebound back to the pre-2008 level.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Correlations of Inter-state Wars during the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ng Rihua and Qi Haixia* (103)

During the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ancient China, inter-state wars broke out more than a thousand times. We have constructed an Inter-State War database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ur statistical analysis has found that in the short run consanguinity relationships helped with inter-state peace and friendship, but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would take shape in the long run. Furthermore, there are no correlations or causality between the notion of "same culture, same race" and inter-state wars. Lastly, the history of inter-state wars during the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demonstrates that a multipolar system is more conducive to peace than a bipolar one.

The Origin of China's Adjustments of 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1980s *Fan Chao* (121)

The drawbacks of the "One Line" strategy we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adjustments of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Line" strategy exposed the Soviet Union's strategic dilemma and enhanced China's confidence to deal with the Soviet strategic pressure, which served as a precondition for China's later strategic adjustments. However, the idea of allying with the U. 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gave the impression that China was asking for favors from the U. S., leading to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retrogression on the Taiwan issue. In order to break the "One Line" strategy's constraints on China's U. S. policy, China brought this strategy to an end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of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in 1982, which in turn resulted in the adjustments of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The adjustments changed China's policies vis-à-vis the U. S., the Soviet Union, as well as the Third World: the status of U. S.-China strategic cooperation was downgraded, the door of Sino-Soviet rapprochement was opened, and relations with the Third World were reexamined.